

刁书仁 赵兴元 著



「明帝列传」

成化帝

皇帝

传



吉林文史出版社

明 帝 列 传

成 化 帝

赵兴元 著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吉林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成化帝/刁书仁,赵兴元著. - 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4
(皇帝丛书·明帝列传)

ISBN 7 - 80528 - 931 - X

I . 成… II . ①刁… ②赵… III . 明宪宗 - 传记
IV . K827 = 4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112117 号

成化帝

作 者:刁书仁 赵兴元

责任编辑:王桂兰 吕海江

封面设计:正典书装

出 版:吉林文史出版社

(长春市人民大街 124 号)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市顺义康华福利印刷厂

开 本:850 × 1168 毫米 大 32 开

字 数:260 千字

印 张:12.5

版 次:1996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2004 年 11 月第 2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7 - 80528 - 931 - X/K·348

定 价:28.80 元



前 言

吉林文化出版社组织撰写《明帝列传》丛书,我有幸应邀,撰写《成化帝》,历一年之功,草成这部历史人物传记。

当我一接触成化帝其人其事,不禁有些茫然。虽说我治明清史已历有年,对明清两朝之史事与人物不能说生疏,但我对成化帝却感到陌生,至多说,似曾相识而已。一方面,我个人对成化帝确无研究;一方面,迄今为止,学术界既无他个人的传记问世,就连有关的论文也难以见到,就是说,学术界主要是治明史者同样缺乏对他的专门研究。因此,我无从借鉴,没有可资参考的成果。如何梳理成化帝的史事,如何评价他,可以说,几乎是一片空白。在这种情况下,由我来撰写他的传记,的确是强自己所难。但也是件好事,因为借此机会重新学习和研究明史,对我来说,适足以弥补自己学术之不足,填补此项研究的一项空白。

近十余年来,学术界研究历史人物已形成久盛不衰的热潮,时至今日,未见稍减。从社会反馈回来的信息也证明,历史人物传记颇受社会各层次读者的欢迎,这又鼓励和推动各出版社愿意组织此类书藉的出版,因而也刺激了社会科学工作者的积极性,关注并投入对历史人物的研究。这一良性循环是保持历史人物传记层出不穷的内在因素。从已出的大量历代帝王后妃及古今名人传记中,我感到多属创业者,或称之为“明君”,随之而来的,便是名臣、名将、名师之类的人



物。特别有名的昏君如隋炀帝、遗臭万世的奸相如秦桧类，也颇受注目，间有他们的传记问世。无疑，这些人物都值得研究，但同时也忽略了一层人物，以帝王为例，如一代王朝中后期的帝王，或为守成，或为中兴，或致亡国等，在已出的诸多传记中，并不多见。这种现象，多少反映了我们研究历史人物的某种偏颇的倾向，忽略了处于这些时期的重要人物的研究。这与我们的不甚全面的认识大有关系。过去，我们研究断代史，偏重于兴、亡两头，前者创业，轰轰烈烈；后者则因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推翻旧王朝，可歌可泣，故为研究者所看好。但对中间或偏后时期的历史则较少甚至不予注意，以为发展平稳，天下无大事，似乎觉得没有什么可以研究；与此相应的是，处于这个时期的帝王人物，也被认为无重大政绩可言，论才能平平，甚至庸劣可鄙，不足论道。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事实上，正是这此平庸乃至庸劣的人物居于最高统治者的地位，举凡所言所行皆关乎国家的兴衰，而对社会的发展无不产生重大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对这类人物是不能忽视的，相反，应加强研究，从他们身上总结出应有的认识。

在我真正开始对成化帝展开研究，并随着研究的深入，便发现成化帝值得重视，实在是一个不应该被忽视的人物。他之所以应该受到重视，恰恰是因为他生活在大明王朝由盛转衰的转折时期。不管他是一个怎样的人，对明朝的发展和前途都有意义。他于天顺八年（1464年）即皇帝位，时年17岁，基本成年，距离明朝开国已过去了近百年。永乐、宣德之际的盛世辉煌，至成化帝时，已经失去昔日的光彩，而黑暗由微入渐，正日益笼罩着先辈们建造的明王朝这座大厦。开国时期轰轰烈烈地创业，已变得平淡无奇；永、宣之后的诸辈儿



孙们尽情地享受先辈创下的丰硕成果，原先的那种励精图治、勤政克俭的传统作风，渐被侈糜无度所替代；长期的“守成”，已失去先辈的进取精神。怠于政事，追求逸乐，就是对永宣之后、成化帝即位前这一时期的基本概括。其结果，造成政治上日趋混乱和黑暗，社会矛盾日益激化，农民的反抗斗争屡屡发生；同时边防也被削弱，北方的强敌蒙古贵族不断进袭明朝北疆，加剧了明朝的危机。

面对这一严峻形势，刚刚即位的成化帝一度雄心勃勃，决心刷新朝政，匡救时弊，确实采取了一些积极措施，给人以维新更始的深刻的印象。《诗经》云：“靡不有初，鲜克有终。”意思说，一个人开始的时候，没有一个不是好样的，但坚持到底，善始善终却是很少的。这是对大多数人生的写照。成化帝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他推行的“善政”没有坚持多久，就厌倦政事，懒得会见廷臣，一议国家要事，就感到心烦。宦官汪直乘虚而入，博得成化帝的欢心，将朝廷大政委诸于他。阴险而凶恶的汪直大施淫威，创办“西厂”，大搞特务统治，监视百姓，还监视朝廷内外百官言行，如发现不满即残酷迫害。汪直实属穷凶极恶之人，把朝政搞得乌烟瘴气。成化帝一任汪直肆虐，却不问政事，专事享乐，与方伎、僧道厮混在一起，不惜抛赠大量金钱，一再给他们颁赏，修建寺庙，不知糜费多少资财！明代宦官之祸，如赵翼所称：始于成化帝的父亲英宗（见《廿二史劄记校证下》）。英宗重用宦官王振，为非作歹，而成化帝没有革除这一弊端，却起用宦官汪直，国事日非。后来虽有察觉，将汪直调离北京，但他造成的严重后果，已败坏了成化朝的政治，难以挽回。综观成化帝的政绩也就可想而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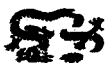
成化帝在位 23 年，正是明朝多事之秋。而各种弊端，社



会矛盾都已暴露无疑。如果他象初即位那样,力除积弊,朝政何至腐败得不可收拾!他的所作所为,已把明朝推向危险的边缘。

明朝自开国皇帝太祖朱元璋算起,到最后的亡国之君崇祯帝,凡 16 帝,共有国 276 年。比之历代,也是历时较长的一代王朝。但是,称得上有作为的“明君”,真是寥寥无几!也只有太祖、太宗(永乐)帝两人,其次是宣宗、孝宗较好,其余多属庸君、暴君之流,如武宗、神宗、熹宗等,都是荒唐的典型人物。象英宗、代宗、世宗、穆宗、毅宗等,能力平平,都属庸劣之辈。成化帝属于哪种人呢?把他说成昏暴之君,似乎有点过;如说是庸君,大体符合他的实际情况,且多劣迹,也该属于庸劣之君。以平常人而论,约而计之,有三种人不可用,即庸人误事,小人生事,坏人败事。这“三种人”如果执国政,就会误国误民,坏了国家大事,其危亡随之而至。用此衡量明代诸帝,除有作为的少数几个人,其余不出这“三种人”。在他们当位之时,普通百姓主要是农民受苦受难,不得安居乐业。的确,生在与暴君或庸君同时代的人是不幸的,只能在痛苦与灾难中挣扎,当忍无可忍之时,惟有铤而走险,从死中求生。成化帝时,土地兼并激烈,赋税不断增加,农民不堪忍受,已开始掀起反抗斗争。这正是他为政所造成的一个严重后果。

成化帝是比较复杂的人物。朝廷中的权力斗争,社会上的各种矛盾,造就了这样一个矛盾集于一身、善恶兼备、前后不一的复杂的人物,其心态和品格自有其特殊性。因此,准确而翔实地反映他的一生,揭示出他的本质,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遵循的原则是,用史实说话,不带个人的喜恶之见,而是客观地看待他的所作所为,既不能陷入当时政争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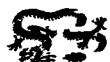
漩涡,站在一方,去反对另一方;亦不能用今天的标准去要求成化帝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应当把他置于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一切从当时的历史实际出发,给予科学的透视,再现他的真实的历史面貌。

我研究成化帝得到一个启示:人们往往认为,一个正面人物如创业之君轰轰烈烈的人生会给人很多宝贵的人生经验;同样,一个反面的或平庸的人生也会给人以许多启发,对于我们都是不可或缺的。如果把两种或几种人生加以比较,人生的高尚、光明,同卑劣、腐败就显得愈加鲜明,是非也更加清晰。所以,我们研究历史人物,不能只研究好的,正面肯定的人物,而人们从中吸取的营养,当然也不能局限于此,应当把成化帝这一类的人物加以研究,写出他们的人生,描绘出他们所处时代的社会生活,把这些丰富而令人思考的内容提供给读者,我想,一定会受到欢迎的。

本书在撰写过程中,查阅了大量的史料,要而言之,以《明实录》和《明史》为大宗,兼及其它各类官书及私家著述,凡个人能力所及,无不涉猎。但是,有关成化帝一生的记载,并不是如想象中的那么丰富,而个人搜求史料,遗漏之处在所难免,这在一定程度上多少也会影响对成化帝的评述;还有,正如前面已说过,我是初次研究成化帝,加之没有现成的研究成果可资借鉴,对他的评价是否妥当,观点是否正确,等等,所有这些,有待继续深入研究,更期待读者给予雅正。

作者

1994年10月31日于吉林



目 录

第一章 少时磨难	1
第一节 才出世愚父被掳	1
第二节 历坎坷两为储君	18
第三节 知书礼天资颖悟	41
第二章 初位勤政	56
第一节 颁诏书革故鼎新	56
第二节 求直言兼听纳谏	65
第三节 抑奸臣举贤任能	82
第四节 劝农桑安养生息	105
第五节 谨天戒蠲赋省刑	120
第三章 为君崇孝	134
第一节 孝父皇尊崇两宫	134
第二节 尊景帝卹忠辩冤	149
第三节 性宽容稍逊刚毅	167
第四节 严律己克勤克俭	180
第四章 忧患乏策	188
第一节 承平久弊端丛生	188
第二节 内忧起人财尽耗	198
第三节 边患频国无宁日	227
第五章 怠政乱纲	247
第一节 重宦官政倾人怨	247



第二节	设西厂汪直擅权	259
第三节	任奸邪朝多秕政	275
第四节	争权益朝臣结党	291
第六章	慈父情君	301
第一节	年十八选立皇后	301
第二节	废吴后痴情贞儿	305
第三节	六年不知生皇子	310
第四节	立储君勤于教诲	319
第七章	命归茂陵	330
第一节	寿未足英年早逝	330
第二节	遵遗诏太子继位	337
附 录	成化帝大事年表	345



第一章 少时磨难

第一节 才出世愚父被掳

正统十二年(1447)十一月二日,一名姓周的妃子为正统帝朱祁镇生下个男孩,初名朱见深,他就是后来的大明成化帝。

朱见深出生的时候,正值明王朝开国 80 周年。这个时期,明王朝刚刚经历了一个繁荣时期,在政治方面,由于从洪武帝开始,明朝实行了一些缓和阶级矛盾的政策,因此,在一个比较长的时期里没有发生大规模的农民反抗运动,社会比较稳定;在制度上,自洪武帝废除了中书省和丞相制后,至永乐年间,基本形成了一套内阁制度,明朝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不断得到加强;在经济方面,从洪武帝开始,明统治阶级采取了一系列鼓励生产的措施,从而,使人口在几十年中有了明显的增加,耕地面积迅速扩大,粮食产量保持了持续稳定的增长,至宣德时期,明中央和地方的仓储都已经非常充裕。《明史·食货志》记载:“是时,宇内富庶,赋入盈羨,米粟自输京师百万石外,府县仓禀蓄积甚丰,至红腐不可食。”所以,谷应泰说:“明有仁、宣,犹周有成、康,汉有文景。”^①

^① 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 28,页 440。



正统帝,即成化帝的父亲继位以后,明王朝便走出了繁荣时代,这一时期,正统帝开始宠用宦官,君臣之情的通达受到阻碍,政治日趋腐败,明朝初期所潜在的各种矛盾逐渐显露和恶化;皇室、勋贵、官僚地主开始肆意兼并土地,农民反抗封建统治的斗争日益趋激烈;皇室和统治阶级挥霍无度,财政危机日益严重;卫所军制也趋于败坏,结果,边地少数民族不断骚扰内地,造成了明政府用兵的频仍。

成化帝正是出生于这样一个由盛至衰的时代。

正统十四年(1449)见深尚不满3岁,这一年的八月十六日,一匹疾驰的报马,沿着从怀来通往北京的驿道急速奔驰,^①进入西直门之后,便直接奔入皇宫。

随着报马的进入,紫禁城里顿时爆发出一片哭声。留守北京的郕王朱祁钰和闻讯赶来的文武百官,一个个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不知如何是好,整个北京城,像是刚刚经历了一场惨重的地震,顿时变得天昏地暗,哭声如雷。

原来,报马带来的是一个悲惨的消息:50万明军在今怀来县以西的土木堡被蒙古瓦剌部打败。见深生父正统被瓦剌也先俘虏北去。随驾亲征的文武百官大部分遇难。

俘获见深父的瓦剌部为元朝蒙古的后裔。元朝灭亡后,蒙古贵族退至长城以北,各自为政,彼此攻杀,其中,瓦剌部自永乐末年以来,势力逐渐强大起来。至见深祖父朱瞻基继位的第9个年头,即宣德九年(1434),瓦剌首领脱欢攻杀鞑靼部头目阿鲁台,并吞灭其部,欲自立为汗,因部众反对,才立元朝皇帝的后裔脱脱不花为可汗。实际上,脱脱不花徒具

^① 北京:明永乐元年朱棣将其做燕王时的封地北平改为顺天府,建北京。永乐十六年迁都北京改称京师,洪熙元年改称北京。正统六年定北京为国都,又称京师,但自永乐元年后,一般人都沿称北京。



可汗空名,大权握在脱欢手中。见深父继位第4年即正统四年(1439),脱欢死,其子也先继位,自称太师淮王。^①也先继承其父的扩张政策,东征打败兀良哈部,威胁朝鲜,并屡次骚扰明朝的辽东、蓟州、宣府、大同等边镇,给明朝北部边防造成巨大的压力。

见深父正统帝此次蒙尘实因宦官王振擅权,威逾人主,决意劝驾亲征所致。

王振,原籍山西蔚州人(今河北蔚县)。原本是一名儒士,后进身为教官,在下层官场混迹9年,终以无所长进,自阉进宫。^②他先被委派教授女官,以后被授予五品局郎衔,入东宫侍奉太子讲读,成为当时正任太子的见深父朱祁镇的启蒙先生。王振为人狡黠,善于逢迎,因而甚得朱祁镇的欢心。见深父朱祁镇(正统帝)登极后,王振被委任为司礼监秉笔太监。

司礼监是明宫廷中二十四人宦官衙门中最重要的衙门。它掌管紫禁城的一切礼仪、刑事及管理当差、听事等杂役。更重要的是替皇帝管理内外奏章,代皇帝批答大臣上奏的折子。皇帝口述的诏令,也由司礼监的秉笔太监用朱笔记录,再交内阁撰拟诏谕颁发。司礼监的宦官整天在皇帝周围,便于了解皇帝的喜怒哀乐,便于迎合皇帝的旨意,取得皇帝的宠信。有的宦官甚至利用皇帝深居简出,和外廷官员接触少的弱点,欺上瞒下,蒙蔽和架空一些昏庸的皇帝。更有甚者,有的宦官在代皇帝批答奏章和传达皇帝的命令时,私下加以歪曲篡改,以此控制威慑百官,造成皇权旁落,宦官专政。

见深父正统帝对王振十分宠信,称他为“先生”,而不直

① 《明史》卷318,《瓦剌传》,页8499,中华书局1974年版(以下同)。

② 《明史》卷304,《王振传》,页777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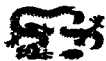
呼其名。在开始的时候，王振还不敢过分放肆，因为当时正统帝的母亲太皇太后张氏精明能干，“军国大计多禀听裁决”，^①她委任大学士杨士奇、杨荣、杨溥主持内阁，风气颇正，正像《明史》所记载的那样，王振“虽宠于帝，终太后世不敢专大政”。^②正统七年（1442）十月，张太后病逝。“三杨”中的杨荣、杨士奇也先后病故，杨溥虽然仍在朝，但年老多病。其他阁臣又是些资历较浅的官员，对王振等宦官没有什么约束能力。在这样一个客观条件下，王振便肆无忌惮，为所欲为起来，威权“日益积重”。^③对于宦官专权，明初是有所警惕的。洪武帝朱元璋在世时，曾置铁牌于宫门，高约三尺，上铸“内官不得干预朝政，预者斩”几个大字。因此明初的宦官多受其约束，不敢妄为。到正统年间，王振有了威权以后，竟将铁牌摘去，自己在皇城内建造府第，还役使百姓建造智化寺，为他祝福。正统八年（1443）翰林院侍讲刘球应诏上言十事，大旨云：勤圣学，亲政务，用正士，选礼臣，核吏治，慎刑罚，罢土木，定法守，息兵争，储武备等，所陈之事井井有条，颇切时弊。刘球言事未尝触及王振，王振也不以为意。偏恰有个钦天监正名叫彭德清的，和刘球是同乡。彭德清倚振为奸，“公卿多趋谒”，^④然刘球却独不与之交往。彭德清为此怀恨在心。为报复刘球，彭德清竟摘刘球疏中的“揽权”之语，对王振说：这便是有意劾公啊！王振听后勃然大怒，将刘球逮捕下狱，暗中唆使锦衣卫指挥马顺置之于死地。马顺不敢违命，深夜带一名小校入狱，持刀刺杀刘球。刘球大呼：“太祖，

① 《明史》卷 113，《后妃传》，页 3512。

② 《明史》卷 113，《后妃传》，页 3513。

③ 《明史》卷 304，《王振传》，页 7773。

④ 《明史》卷 162，《刘球传》，页 4406。



太宗……。”声还未绝，头已被砍断，血流遍地。杀死刘球后，马顺将他的尸身支解，埋在狱中窗户下。刘球的惨死，似乎得到了天助，杀害刘球的那位小校不久暴病毙命。马顺的儿子也得了一种病，难以治愈。一日，马顺的儿子病狂大哭，狠狠抓住马顺头发，拳打脚踢，并痛骂道：“老贼！我刘球并无过错，你敢趋附逆阉，害死我，看你将来如何？我先带你子去了。”^①马顺惊恐万状，不知所措，抬头一看自己的儿子两目上翻，仆地而死。他们的下场，也许是“报应”吧！

一时间，王振权倾内外，炙手可热，公侯勋戚呼之曰翁父，畏祸者争附王振免死，“贿赂倖集”，^②许多梦想飞黄腾达的官员，不顾礼义廉耻，对王振百般逢迎，极尽歌功谄媚之能事。工部郎中王佑因为善于逢迎，升为工部侍郎。一天，王振见到王佑，便打招呼说：“王侍郎何以无须？”王佑低声下气地说：“老爷所无，儿安敢有？”无耻之极，于此可见一斑。朝廷官员争相投靠。王振门庭若市，收受贿赂，卖官鬻爵。据说，进王振府宅馈送百金者得见其一面，馈送千金者可受其一餐，他家称得上金山银窑！后来抄没他家产时，有金银六十余库，玉盘百面，珊瑚高达六、七尺的有二十余株，其他珍珠宝玩不计其数。

王振如此专横奸险，并未引起见深父正统帝的察觉。正统十一年(1446)，正统帝又赏给王振白金、宝楮、綵币等物，并特赐敕一道，内中“极褒美”之辞。

在王振这帮奸党的扰乱下，朝政日非一日。最危险的是，边防遭到严重的破坏。首先是军屯制度开始瓦解。

① 《明史》卷 162，《刘球传》，页 4406。

② 《明史》卷 304，《王振传》，页 7773。



早在开国初,明王朝就实行在边疆地区屯田的制度,驻防的士兵除了守边,还要耕种农田,以足自身需要,收效很大。但王振败坏朝纲后,分驻各地边镇的亲王、太监和将官,乘机大谋私利。主要手段是侵占士兵的屯田为私家庄田,并役使士兵替他们耕种。^①不仅如此,他们还要向失去屯田的兵士逼取额粮和税收,兵士们失去了自己的土地,忍受不了这样的剥削和虐待,只好一逃了之。早在正统三年(1438),兵部的报告中就已做过统计:全国卫所在逃军人达120万,约占全国卫所兵士总数的一半。针对这些问题,朝廷并未能采取有力措施改变这种状况。相反,王振之流利令智昏,为满足贪得无厌的欲望,不惜勾结蒙古贵族,进行大量的走私活动。王振派遣他的私党、镇守大同的太监郭敬,每年私造箭簇数十瓮送给瓦剌,以换取瓦剌的良马。王振等助纣为虐的行径,加剧了边防危机。正统十二年(1447)正月,巡抚宣大金都御史罗亨信上奏说:“瓦剌也先专候衅端,图入寇,宜预于直北要害,增置城卫土城备之,不然,恐貽大患。”^②兵部尚书邝埜慑于王振的淫威不敢主议,只好将这个正确的建议束之高阁。

王振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不惜祸水东引。他对瓦剌的贡使优礼款待,有求必应。按明朝规定,瓦剌每年到明朝的贡使不得超过50人。正统以来,瓦剌贪图明朝的赏赐,又欺负明朝的软弱无能,已把贡使增加到2000多人。如果不能满足他们的要求,他们就在边地制造事端。瓦剌贡使数量的不

^① 《明史》卷77,《食货志》,页1885。

^② 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32,页471,中华书局1979年2月版。



断增加使明朝赐予的财物不得不与岁俱增。正统十四年(1449)二月,也先派贡使 2000 人到北京,为了多领赏物,竟“诈称三千人”。对于瓦剌部的狂妄行径,王振不仅不谨慎处理,而且轻开衅端。他命令礼部按实际贡使人数给赏,并削减马价五分之四,使瓦剌人仅“得五分之一”。^①也先得知后大怒,是年七月,“遂诱协诸番,分道大举入寇。”^②

野心勃勃的也先早就探知明朝的虚实,伺机寻衅,此时得了口实,马上集结各部,兵分四路向明边界进攻。其路线如下:

- 一路是脱脱不花率兀良哈部众,入辽东;
 - 一路是知院阿剌率所部扰宣府,围赤城;
 - 一路是以骑兵进袭甘肃一带;
 - 一路是也先亲率主力进攻大同;
- 主攻方向是大同。

七月十一日,也先亲率瓦剌军大举进扰,“兵锋锐甚”。大同参将吴浩与也先首战猫儿庄,全军覆没。“塞外城堡,所至陷没”。^③自此,边疆告急的文书就像雪片似的飞入京城。

当战火烧近山西蔚州,王振家乡时,王振心想这是一次扬威远方的机会,于是百般怂恿正统帝亲征。正统帝久处深宫,对战争从无亲身感受。王振的鼓动使他想到了他的曾祖永乐帝和父亲宣德帝六次亲征漠北,大展“天威”的情形。想到这,他也产生了亲提六师,扫荡漠北,做出一番动人心魄伟绩的愿望。因而他欣然接受王振的建议,召集群臣,谕令京师准备出征。兵部尚书邝埜、侍郎于谦极力劝谏:“六师不宜

① 《明史》卷 328,《瓦剌传》,页 8500。

② 《明史》卷 328,《瓦剌传》,页 8500。

③ 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 32,页 472。